

弗雷泽人类心智发展三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与表征

刘 曼, 李 珂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出的人类心智发展三阶段进化图式反映了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特征, 汲取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以及泰勒的“文化遗存”和“人类心智同一性”观念。巫术、宗教、科学三者进化关系的探索说明宗教的起源、本质和发展问题, 以此揭示人类社会进程中文明与蒙昧、理性与非理性、现在与过去的关系, 探讨人类心智发展的过程与归宿。其主旨本无可厚非, 但其研究方法、理论观念及对宗教和科学本质认识的缺陷, 使弗雷泽在这一进化图式中所表现出的疑虑和不确定性常易为人忽视, 他本人因此饱受诟病, 《金枝》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关键词] 弗雷泽; 《金枝》; 人类心智三阶段论; 达尔文; 斯宾塞; 泰勒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6-0076-06

On Sources and Features of Frazer's Theory of Three Stages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Mind

LIU Man, LI K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8,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schema of three stages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mind that Frazer proposes in *The Golden Bough* obviously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tionalism and individualism at his time. Absorbing the evolution ideas of Charles Darwin and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concepts of cultural survivals and identity of human mind of Edward Tylor, Frazer tries to explain the origin,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through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of magic art, religion and science, and to discuss the process and destination of development of human mind by uncovering the relationship of civilization and savage,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now and the past. It is quite understandable for Frazer to choose this topic for his research, but the obvious fatal defects of his research method, ideas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makes his doubt and uncertainty on this evolution schema usually be neglected, and not only he himself often be criticized, but the value of *The Golden Bough* be impaired to a certain degree.

Key words: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theory of three stages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mind; Charles Darwin; Herbert Spencer; Edward Tylor

收稿日期: 2013-05-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11&ZD104);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对中国神话学的影响研究”(12C0047); 湖南工业大学科研项目“古希腊悲剧功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2011HSX11)

作者简介: 刘 曼(1970-), 女, 陕西安康人,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研究; 李 珂(1973-), 女, 湖北武汉人, 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中外文学、现代汉语研究。

为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原始基础,弗雷泽在《金枝》中将广博庞杂、包罗万象看似孤立的神话、传说、寓言、巫术和习俗的资料汇集分类,放进了一个精心构筑的框架之中,试图说明巫术、宗教、科学的关系。他从解释人类早期心智中的蒙昧性和荒谬性因素开始,并为人类心智的发展过程做出了巫术、宗教、科学依次进化的阶段划分:在巫术阶段,人类没有灵魂与神灵的观念,因为原始人确信自然现象严整有序并前后一致,他们相信自己只要懂得一定的巫术仪式和适当的法术就能控制自然、达成愿望;人类逐渐明白仅靠巫术并不能完全掌握神秘力量,于是开始把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归于神灵,开始邀宠、取悦和讨好这些神灵,进行崇拜活动,这就是宗教阶段;但人们最终会认识到主宰这个世界的既非他们自身也非神灵而是自然规律,人类就进入了科学阶段。

《金枝》的写作意图看似是对内米狄安娜神庙传说中的祭司继任制度进行解释,但弗雷泽意欲探讨的却主要是巫术与宗教问题。为论证内米祭司“森林之王”的身份,弗雷泽从巫术原理开始讨论人类社会早期的国王常常身兼祭司和巫师的多重身份和职能问题。在论述了交感巫术及其原理、巫师身份演变之后,他做出人类社会进程中普遍存在着巫术、宗教、科学三个阶段并逐渐依次变化的推测:“很可能……巫术的出现早于宗教的产生……”。^{[1]234}而在《金枝》最后,这种推测更为明确:“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较高级的思想运动,就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大体上是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科学这几个阶段的”;^{[2]304}“总之,作为解释自然现象的宗教,已经被科学取代了。”^{[2]305}然而,接着他又不无矛盾地写道:“思想史告诫我们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归根结底,巫术、宗教和科学都只不过是思想的论说而已。”^{[2]306}尽管弗雷泽本人的论述不无犹豫踌躇和自相矛盾之处,但他的谨慎和矛盾之处常为人所忽略,《金枝》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因此而被削弱。由此,对弗雷泽人类心智进化三阶段理论的思想渊源及表征进行探查和厘清,是进一步深入研究《金枝》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

《金枝》第一版完成后,他在写给出版商的信中表明,它是“一部原始宗教史研究”。^{[3]95}《金枝》首版的副标题为“比较宗教研究”,而二、三版以及节本第四版的副标题都是“巫术和宗教研究”。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金枝”之所以能够成为《金枝》,就在于“金枝”是“森林之王”体外灵魂,亦即其生命之所在的树枝;其茂盛或衰弱就是“森林之王”生命力或强或弱的象征。“金枝”能否被攀折就是老王是否强健的明证,这种巫术性和荒谬性就是内米祭司制度的秘密。弗雷泽以内米宗教为起点,广泛搜罗“野蛮”人的神话、传说、习俗、巫术和禁忌等并进行比较,以此来解释和说明巫术性和蒙昧性是原始宗教的主要基础。他的这一研究主旨和对“原始心智”问题的关注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知识危机有很大关系。

弗雷泽 1854 年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堡镇一个富裕虔诚的长老会教家庭,15 岁时进入格拉斯堡大学学习古典学、哲学、宇宙物理学等。作为欧洲启蒙运动中心之一,苏格兰理性启蒙思想极为活跃,产生了大卫·休谟、亚当·佛格森等重要思想家,出现了被后人称为“爱丁堡学派”这样的学术团体,苏格兰的一些大学就是当时理性启蒙思想的重镇。但苏格兰社会思想的发展并不平衡,乡村地区实际上还保留了较多的封建因素。弗雷泽的父母信奉长老会教,认为宗教是极其神圣而内省的事情,以至于他们在家庭从不谈论任何与宗教相关的问题,弗雷泽幼年起就对宗教充满了好奇,格拉斯哥的学习和熏染更加强了他对宗教问题的思考。其日后对宗教问题的关注与这种宗教经验和思考关系密切。

弗雷泽的思想深受英国实证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1874 年,弗雷泽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接受古典学教育,但他的阅读极为广泛,涉及古典学、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此时,英国盛行一种宽泛的实证主义的社会思想,但其源头、方法和特征则是个人主义和心理学的。^{[3]43}个人主义理论将社会和经济的相互作用降低到个人的动机问题,认为可以通过理性自省的传统方法和理解个体心理的途径来研究和理解社会制度和组织。这种倾向和实证主义的结合如果用来探索人类行为的伦理动机,就可能会出现一种人可以生活在一个动机大

尽管弗雷泽从未谈起过《金枝》的写作缘起,但

于结果,意愿高于事实,自己可以掌控的世界之中的观念。这一假设深深扎根于英国哲学的主题之中,一直延续到整个兴盛繁荣的维多利亚时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动摇了整个欧洲的思想基础。身逢其时的弗雷泽自然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同时,弗雷泽仍然对宗教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幼年的宗教经验及后来对宗教问题的思考使他对宗教的起源和作用机制发生了兴趣,而且,他从当时的人种志材料中看到了某些原始异教宗教实践中的献祭行为与基督教信仰中的某些宗教行为的相似性,于是希望从原始宗教的起源来理解基督教的起源、作用机制与发展。宗教产生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早期格拉斯堡及剑桥的教育也使他希望从他热爱的古典学中找到答案,柏拉图的认识论促使他考虑人类心智问题(他此前为获得三一学院研究员薪金而提交的论文就是《柏拉图理念论的形成》),但他认为应该用科学心理学的方法代替柏拉图的认识论,这种对心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强调与当时英国个人主义理性自省的经验哲学不谋而合。加之此时英帝国殖民活动十分繁盛,旅行者、传教士和冒险家从异域带回的各种奇风异俗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东地中海地区及其他一些地区特别是希腊古文明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对前历史时期和人类早期行为进行理解的新观念: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寻求事物的起源找到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组织的原始心理基础,就能理解和解释其机制,甚至预见其发展。这无疑影响了弗雷泽对宗教问题的认识。无独有偶,因为勤奋诚实和博学,弗雷泽在1884年被推荐给《大英百科全书》的编纂者,负责编纂“禁忌”和“图腾”两个词条。在这两个词条的撰写过程中,通过收集和阅读大量人种志材料,弗雷泽发现:原始人通过杀死动物的献祭行为来抚慰和取悦于神灵。于是,他开始对这种宗教献祭行为发生的心理基础进行研究,探索这些神秘观念的起源及原始人的心智问题,以此理解基督教的起源、本质及发展,成为他原始宗教研究的主旨和目的。

二

进化论思想是弗雷泽人类心智三阶段论的主要理论源泉之一,其中最主要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

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

19世纪下半期特别是最后三十多年,整个欧洲弥漫着进化论的味道,更不用说这个时候兴起的人类学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时期的人类学家都是进化论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发表,直接造成了欧洲思想界的强烈震动。1871年,《人类的由来》出版,其“人猿同祖”的人类起源说彻底动摇了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的“上帝造人”说的根基,构成了对基督教的最严重挑战,也造成了科学与宗教在随后二、三十年间的激烈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是进化论等自然科学主义者对宗教的质疑和挑战,一方面是即使并没有严格基督教信念但无法接受偶像突然坍塌、人类生活完全与上帝无关的观念而成为反自然主义论者的对宗教的维护和坚持,更不用说那些恪守基督教信仰的反自然主义论者了。牛津、剑桥这样传统的大学自然成了论争对垒的中心。作为三一学院的学生及后来的年轻研究员,弗雷泽实际上处于这场对垒之中,他的一些同事和朋友都是反自然主义论者。^{[3]36}弗雷泽对基督教问题的思考,对原始宗教起源和作用机制的探索在这时虽说不上具有明确的反宗教立场,但至少不是严格的信仰者。值得注意的是,有如达尔文一样生性内向、谨慎羞怯的弗雷泽同样不可能公开表达他的宗教观点,而且在其后的几十年间他都没有明确表达过他的宗教立场。虽然他本人对原始宗教与基督教的性质是否具有同质性问题上态度暧昧,但他对原始宗教起心理基础的探索实际上是对基督教起源、作用机制、发展的另一种思考和研究,即将原始人宗教动机的推测性重构导向了基督教的基础和根本,或者说,基督教问题在《金枝》中没有被公开讨论仅仅是出于谨慎和敏感的原因。

以往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弗雷泽的进化论思想主要受达尔文的影响,实际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对弗雷泽的影响更大更直接。《物种起源》发表时,赫伯特·斯宾塞早已阐述了的进化论内容已经成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做了很好的铺垫。弗雷泽进入剑桥大学时,恰好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极为盛行的时期:斯宾塞1862年出版的社会学著作如《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和《心理学原理》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信奉社会过程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依自然规律来解释,强调用经验和感性材料

通过观察和检验来认识社会,避免对研究对象做任何价值判断的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原则,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可以被看作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个类别。弗雷泽在剑桥学院时大量阅读斯宾塞著作,有文献表明,仅在剑桥学习期间,其藏书中斯宾塞的作品就多达十多部。^{[3]43}1885年,弗雷泽在人类学协会发表其首篇人类学论文——《某些丧葬习俗对灵魂原始理论的说明》的演讲时,斯宾塞是听众之一,在事先提交论文时的一封信中,弗雷泽表明了斯宾塞对他的影响:“……很荣幸能像那些参加我的演讲的人表示敬意。赫伯特·斯宾塞先生是我应该特别感谢的,其作品对我的影响极为深刻并将持续终生,它们对我热切寻求知识的乐趣的启蒙和激励是难以言表的。”^{[3]22}

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科学自然主义,“社会有机论”和“社会进化论”是斯宾塞社会思想的两条主线。“社会有机论”将社会视为一个功能与结构相互联系、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有机系统,通过简单的体积增大和群体结合形成整体,从简单部落社会发展为有结构功能差异的文明国家。“进步是朝着更大的规模、凝聚力、多样性与确定性的方向发展。”^{[4]154}而社会组织有两类,一类是直接起源于对个人目标的追逐,只是间接导致社会功利,无意识且不靠强力发展起来的;一类是源于对社会目标的追求,间接地带来个人利益,有意识并且通过强力发展起来的。^{[4]154-155}弗雷泽对斯宾塞的社会学说是既吸收又抵制的。他在论述巫术阶段向宗教阶段过渡时,公共巫师的巫师兼祭司的身份及其求雨止旱、丰产等巫术活动所带来的间接公共利益,显然是受斯宾塞第一类社会组织产生与发展理论的影响。同时,在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用于人类心智发展进程中时,弗雷泽走得更远。前者关于自然科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联系,被弗雷泽用于人的心智、身体和社会的关联之中:既然社会和社会组织是社会复杂进化的结果,社会制度的进化发展就应考虑人类心智的作用,因为社会进化和心智活动是系统组织起来并发挥作用的。这样,外部世界发展变化就与人类心智活动形成了一种结合,对原始文化的研究就可以通过对原始人的心理活动的研究和推测来进行。在弗雷泽看来,对巫术的信仰和依赖反映了人

类早期历史时期的一种更为原始的思想状态,但随着人类心智的发展,对巫术的谬误和无效的认识促使那些较为聪明的人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控制自然的方法。即从凭借符咒魔法的巫术阶段到采取祈祷、献祭等温和献媚手段哄诱神灵的宗教阶段的过渡。“这种对于巫术无效的重大发现,必然会在那些精明的发现者的思想上引起一种可能是缓慢但却是带根本性质的革命……”,“那些具有较深刻思想的人正是在这样或者诸如此类的思想下完成了从巫术到宗教的伟大转变”。^{[1]239}但是,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实在人为的动机和约束往往与非真实的宗教和超自然力量存在着种种冲突,人们始终难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和生存。然而,人生来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而知识总是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永远不停地前进的,当科学完全解开自然之谜之时,一种完善的道德在伦理上是可能的,那么生存从理论上讲就在人类意识的控制之下。“人类获得的更多的知识,将会使各方面看来似乎真实的混乱,都化为和谐……。”^{[2]305}显而易见,科学取代巫术和宗教是弗雷泽人类心智进化的终极目标,或者说,人类最终会摆脱迷信蒙昧的宗教阶段,才是弗雷泽设置人类心智发展巫术阶段、宗教阶段、科学阶段进化图式的主旨和目的。

三

弗雷泽的人类心智进化三阶段论还深受爱德华·泰勒的影响,后者的《原始文化》一书对弗雷泽的影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弗雷泽在《某些丧葬习俗对灵魂原始理论的说明》一文的演讲中也谈到了泰勒对他的影响:泰勒使他开始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对其作品的仔细研读是他生活中的重要事情。^{[3]29}

首先,弗雷泽吸收了泰勒的文化进化阶段论观点和“人类心智同一性”观念。泰勒认为,“人类社会漫长时期的发展中的主要倾向就是从蒙昧状态向文明状态过渡”,这是“妇孺皆知的真理”;文化的发展“是按照那种依据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的阶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来衡量的”。^{[5]23}而“文明人的智力到此为止仍然保留着极为明显的古代痕迹”。^{[5]54}泰勒还认为,他所研究的蒙昧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人类早期状态相

符合的,高级文化是从人类初期文化逐渐发展或传播起来的。他和他的追随者认为在当代土著的行为中可以发现进化链的联系,这些“野蛮人”(弗雷泽时代对无文字族群的称呼)被假定为活化石,可以说明文明人几千年前的形态。“一方面,在文明中有如此广泛的共同性,使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拿一些相同的原因来解释相同的现象;另一方面,文化的各个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和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5]1} 泰勒这种人类文化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观念与弗雷泽所受到的斯宾塞社会有机进化论观点的影响不谋而合。“文明极其复杂,而蒙昧则相对简单。文明毫无疑问是由蒙昧逐渐演化而来,要彻底理解文明,首先要理解蒙昧。”因此,弗雷泽认为,他那个时代未受现代世界影响的不识字的农民还保持着早期人类的心理,通过对他们所践行的风俗仪式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发现人类早期蒙昧的心理状态,找到人类心智的进化图式:即以现代“野蛮人”的原始行为模式来推测早期人类心理。对于巫术、宗教、科学这一进化图式来说,从落后地区的“野蛮人”仍在践行的某些荒谬的巫术行为或者习俗中可以看到较高级文明中“现代人”的过去,“现代人”的蒙昧与非理性就是过去野蛮时期的遗迹。因为,人类的心智和精神活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相同的心理和思维必然产生同样的活动结果,人类心智进化必然经过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科学的发展路径,如果说现实中还存在着“野蛮”与“文明”的对立和差异,那只是进化程度有所差异罢了。

弗雷泽还深受泰勒“文化遗存(culture survivals)”观念的影响。泰勒认为,在人类文化发展中,会有一些风俗习惯或观念保留下来,它们可以以新的形式适应新的环境而继续发挥作用,这就是文化自身的稳定性。如古罗马人用来占卜的动物趾骨后来变成了骰子,十九世纪不列颠习俗中姑娘们也用动物趾骨来占卜出嫁;中国人通过掷骰子来进行赌钱游戏或心怀虔诚地在庙里抽签占卜;德国民俗中认为左脚起床一天都会不吉利的观念等等。在泰勒看来,这些习俗不应被认为是“迷信”而被轻视,而是作为“文化遗留”包含了一定的文化意义。^{[5]56-68} 弗雷泽深受泰勒“文化遗留”这一观念的

影响。但二者不同的是,泰勒是在中美洲旅行时接触到了一些原始文化现象后,才开始其人种志材料收集和研究的,他认为一些文化习俗和观念的延续和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基础,也是文化自身稳定性的体现。而弗雷泽则是在传统的剑桥学院的书斋里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他虽不像现代人们误解的那样从不走出书斋,也曾到德国、西班牙、希腊、罗马等地旅行,但相对而言,他受到的古典学训练和他接触到的相对较高级的文明,使其始终对人类发展较为缓慢文化中的习俗包括英格兰乡村习俗抱有一种偏见,认为那是人类蒙昧时期野蛮心智的产物,“野蛮人”甚至某些“现代人”所践行的习俗仪式是人类蒙昧心智遗迹的体现,应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而消亡或者被丢弃。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还记录了许多原始部落乃至基督教教派的魔法观念,并认为理解魔法的关键在于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的人类智力中既智慧又蒙昧的一种能力,人类在低智蒙昧的智力状态下发现了事物的实际联系但曲解了这种联系,因而错误地以这种纯粹幻想性的联系为指导来发现、预言和引出事物变化的规律。巫术是一种类似于科学的活动,以真正的观察为基础,但却把想象的联系和实际的联系错误地混同起来,而且这种巫术观念从其产生的低级文化中保留到了它们的高级文化中。尽管泰勒把巫术信仰归为“文化遗留”的一种,但他是把巫术观念和巫术行为归为人类的蒙昧和无知的。泰勒的这种“文化遗留”观念以及其对巫术产生基础的论述对弗雷泽的巫术理论影响巨大,不仅其基于“传染律”或“接触律”的“接触巫术”包含了泰勒巫术观念的影子,而且在巫术与科学的关系上,弗雷泽显然是发挥了泰勒关于巫术的“科学”基础的观点。弗雷泽认为就认识世界的概念而言,巫术和科学都认为事物的演替有规律可循,但由于巫术对控制事物变化的特殊规律的性质的认识是错误的,因而巫术虽是科学的“近亲”但却是它的“坏姐妹”(bastard sister)。^{[1]220-222} 应该说,弗雷泽受泰勒关于巫术之“科学”基础的启发对巫术原理的论述和阐释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他对巫术和科学本质的理解和解释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且他将人类文化中很多习俗仪式实践,视为人类心智中残存的巫术观念或由此观念而产生的种种“迷信”行为,这相对

于泰勒的“文化遗存”观念来说,显然是一种倒退。原因就在于弗雷泽的着眼点是人类心智的进化,随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非理性行为逐渐为理性行为所代替:“今天伪巧的女巫制造的种种幻象,明天她自己就会予以废除。它们在常人眼里似乎像是真实的,但必将化为一阵云烟……”^{[2]305} 他想要真正发现的是文明最终取代野蛮,或者说在人类心智的进程中,理性文明的科学阶段终将战胜蒙昧的巫术和宗教阶段,成为人类心智进化的最完善阶段。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弗雷泽浸淫在英国经验哲学传统中个人主义和心理学方法中,深受达尔文、斯宾塞和泰勒的影响,在进化论极为盛行的氛围中探索宗教的起源、本质和发展问题,其选择的研究起点是原始宗教,所致力于解释的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原始基础,企图通过揭示人类早期心智的荒谬性和蒙昧性以及它们在“现代人”身上残存的“遗迹”,揭示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和联系,寄望于科学的发展及人类对知识的追求最终克服战胜这种蒙昧的“遗迹”,人类心智最终会克服蒙昧和非理性的宗教阶段,走向理性的科学阶段,达到心智进化的至善状态。然而,尽管弗雷泽带有他那个时代理性主义者的盲目乐观和自信,但其研究实践、思想变化及其在《金枝》中关于巫术、宗教、科学关系自相矛盾的论述都表明,他的思想极为矛盾,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充满了疑虑甚至是悲观,其人类心智进化三阶段理论也因此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不确定性。在《金枝》行将结束之时,弗雷泽用三种不同颜色的纺线交织而成的织物的颜色变化来比喻人类思想的发展:黑线代表巫术,红线代表宗教,白线代表科学。这块织物的颜色先是黑白交织,随着红色的嵌入逐渐成为殷红,虽然白线正在织入。但对于这块织物的未来颜色,弗雷泽并不确

定,“一片淡淡的微光已经照亮着这张思想织物的背景,但它的另一端还深锁在浓云密雾之中。”^{[2]308} 人类追求知识“美好前景的最前端却横着一道阴影。”^{[2]307} 在对人类文明的前景表现出疑虑的同时,他承认巫术、宗教、科学的划分只是思想的论说,而对于他的研究,弗雷泽也一再表明,“……理论的命运迟早都会像儿童用沙子堆起的城堡一样为新兴的知识浪潮所淹没,我的也不例外。我把它看得很轻,它们只是我用来汇集事实的框架罢了。我相信,一切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汇集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在我的各种理论由于失去了效用而和那些习俗及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汇集,仍保留其效用。”^{[2]11} 也许,这并不是弗雷泽的自谦。正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弗雷泽的作品是“有瑕疵的珍宝,或者是美玉,或者是绊脚石”。《金枝》所蕴含问题和价值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检视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Sir James George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Third edition: Part I, The Magic Art: Vol. I*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5.
- [2] Sir James George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Third edition: Part VII, Balder the Beautiful: Vol. II*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5.
- [3] Robert Ackerman J. G. Frazer: *His Life and Work*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 于 海. 西方社会思想史[M]. 3版.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 [5]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重译本. 连树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黄声波